

观影忆经历 苦难引共鸣

亲历·回忆

当年吃树皮救了我一命

口述人:袁存勤
年龄:76岁
籍贯:西华县东夏镇

1942年,我才6岁,虽然家里有地种,可碰到了灾荒年,几乎没什么收成,我们家兄弟姐妹又多,吃饭成了大问题。在我的记忆里,当时家里也存放了些粮食,可恰巧碰到了国民党士兵收缴军粮,把家里的粮食都收走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,家里没东西吃,我们就吃花生壳,先把花生壳捣碎,再用石磨磨成粉末吃,后来还吃花生秧,最后就连青麦苗也都割吃了。

为了保住性命,我们还吃过树皮,也幸亏有树皮可以吃,我的命才保住。当年,由于我身体不好,加上没东西吃,经常躺在床上起不来。起初,家人看到村子里有人吃榆树皮,就开始找榆树,割树皮吃。树皮很苦,可为了保住命,家人也都硬着头皮吃了,榆树皮吃完了,就吃柳树皮。记忆中,当年我们一家一连吃了一个多月的树皮。

后来,看到村子里有人到外地逃荒,为了不被饿死,我们弟兄几个一起,推着独轮车,到外地逃荒,去过驻马店等地。但最后,我们又回了家。

晚报记者 张洪涛 整理



袁庆喜老人向记者讲述当年的蝗灾

靠乞讨度过荒年 家人流离失散

口述人:李玉花
年龄:80岁
籍贯:高水县谭庄镇

想起当年的情形,我心里就不好受。1942年是个荒年,为了糊口,母亲卖掉家里的地,出门要饭去了。因为家里孩子多,粮食不够吃,我和姐姐也相继被卖到了谭庄喻家寨(今高水县谭庄镇喻营村一带)。

刚开始,买我的人说是要把我带回家当闺女养,谁知道转手就把我卖到了大户家里当丫鬟,那一年我才10岁。在大户家里,虽然能吃饱饭,但每天被人使唤来使唤去,日子过得很不好受。记得那家的一个大丫鬟对我说:“你那

么小,不知道将来他们还会把你卖到哪去,有机会就快跑吧。”因为担心被卖到外乡,我趁主人不在意的时候,偷偷地跑了出去,找到了当时正在谭庄要饭的母亲。买主追过来找我时,同乡的好心人把我们母女藏进柴火垛里,才躲了过去。后来,我就跟着母亲沿路乞讨。

那时候,一些大户家里还有粮食,我和母亲跟着别的灾民一起到大户家门前磕头要饭,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或两个杂面馒头。现在一想起来当时的情景,我就会觉得屈辱,心里不好受,但那时候实在是饿得没办法,只能去乞讨。靠着乞讨,我们一家人度过了荒年,但是在这场灾荒中,和我同时被卖的姐姐却和我们一家人失去了联系。

晚报记者 宋风 整理

蝗虫多得连阳光都遮住了

口述人:龚庆喜
年龄:80岁
籍贯:沈丘县槐店镇

1942年,我10岁。当时,蝗虫真多,白天蝗虫飞过时,就像会移动的乌云一样,有时候连阳光都会被它们挡住。

当年,有一次我在田地边的水沟旁玩泥巴,突然看到一个像篮球那么大的泥球从田地边的水沟向田地里面滚动,我出于好奇跑

过去看了一眼,没想到泥球里面竟然都是蝗虫,泥球滚到哪,蝗虫就会蜂拥而出,啃食附近的庄稼。还有一次,我和父母从外面回家,一打开家门就看到屋顶上爬满了蝗虫,院子里的土堆里也都有蝗虫钻进钻出,灶屋屋檐下很多蝗虫头尾相连一大串一大串吊在那里。

当年,蝗虫过后,村里的所有高粱和谷子颗粒无收。

见习记者 张肇 整理

真没想到能活过来

口述人:胡汉文
年龄:86岁
籍贯:漯河市郾城区老窝乡北胡村

1942年,我16岁。那一年,由于旱灾,加上蝗灾,人们没有饭吃,到了冬天还穿不上棉衣,苦得很。于是,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外出逃荒要饭。那时,真是太苦了,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,也没想到我能活过来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当年人们都饿得有气无力,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,无声地死去了。令人气愤的是,当时的国民政府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除了地主富农外,贫苦农民都没有吃的。

当时,我们家有4口人,父亲、母亲、我和弟弟,起初,以野菜为生,后来,野菜吃光了,就吃树叶,树叶吃光了,就吃树皮。再后来,能吃

到榆树皮就算是最好的了。树皮吃光后,没有什么可吃的了,没办法,连有毒的野菜我们也吃。总之,能入口的东西都入口了。吃这些东西,致使我和弟弟解不下大便,都是母亲给我们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

唉,那时候,真是苦熬呀!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,现在一提起当年的事,我就想大哭一场。当时,我们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,每天早上,没有母亲的帮助,我们连起床的气力都没有。

“我们不出去,死也要死在家里,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。”当时我母亲说,我们一家人不能死到外边,认死也不外出逃荒要饭。事实证明我母亲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我们家3亩多地,终于苦熬到1943年麦口,没等麦熟,我们就开始揉着麦子吃。麦子熟后,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点儿。

晚报记者 张劲松 整理

道路上,狗吃人 棚屋里,人吃人

口述人:周文华
年龄:82岁
籍贯:高水县双桥村赵楼

1942年,我12岁,正在上小学。由于父亲是教书先生,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儿,所以经常会有邻居到我们家借吃的,但我母亲不敢多借,最多一捧,还故意把手张开点儿,让粮食洒出来点儿。当年,在路上总能看到野狗撕扯饿死的人的尸体,那个血腥的场面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。

当年,不仅没有吃的还有病灾,村里最惨的一家,一天抬出来两口人,一个老人、一个小

孩。逃荒更不是啥稀罕事,我经常看到从扶沟、西华逃荒过来的人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,有两家逃荒的住在一个棚屋里,一家的小孩,头天夜里还在睡觉,第二天早上突然不见了,家人找遍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,最后在灶台上发现了小孩的脚指头,估计是饿极了,另一家的人把孩子给吃了。现在想想那时候真不是人能活的。好不容易等灾过去了,地里有了收成,饿怕了的老百姓,在麦苗刚泛青的时候就把麦穗摘下来,把麦芒去掉,用石碾子把麦皮碾成布久(音 bujiu)吃,但因为不好消化,硬生生撑死了不少人。

见习记者 姬慧洋 实习生 王勇 整理

链接:河南大饥荒

从1941年开始,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始出现旱情,收成大减,有些地方甚至已经“绝收”,农民开始吃草根、树皮。到1942年,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,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,树皮几乎被剥光,灾民开始大量死亡,在许多地方出现了

“人相食”的惨状。

这场灾难从1942年春天开始,一直延续到1943年,遍及全省110个县,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,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,沿途饿死、病死、扒火车挤车(天冷手僵从车顶摔下来)轧而死者无数。

在这次大饥荒中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(Theodore H. White)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、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
据《太康县志》载:当时一亩良田只能换几十斤小麦,一个十七八

岁的大闺女只能换40斤粗粮。

巩义《巩县志》是这样记录灾荒的:民国31年(1942年),大旱,几近绝收,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。农民多以树皮、雁屎、观音土充饥。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,巩县饿死19100人。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称:巩

县逃荒80505人,饿死4431人。

《延津县志》上说:民国31年(1942年),旱灾,减收十分之六。延津位于黄河之北,亦是重灾区,可当地对灾害的记录,除去《延津县志》上寥寥数语外,再无其他。

晚报记者 张劲松 整理

河南郑州讯 昨日上午,图书《1942 饥饿中国》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出版集团举办,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领导、河南商报主创人员受邀出席。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参考消息、新京报、南方都市报、大河网等20余家媒体到场采访。

《1942 饥饿中国》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要媒体河南商报策划采写,历经半年多时间,走遍河南全省寻访,并重走1942年灾民逃荒路。书中包括20多位亲历者的讲述,近50位目击者的珍贵照片,3000多里重访之路,最大程度还原了1942

首部全景呈现1942大饥荒历史纪实作品

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图书《1942 饥饿中国》在京首发

年河南大饥荒。今年11月初,由中华书局编辑成书《1942 饥饿中国》。

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张建说,这本书是河南商报和中华书局合作的结晶,也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合作的结晶。这组大型纪实报道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华书局编印成书并进行

首发,不仅拉长了新闻本身的影响力——使得新闻的影响更深更远更持久,还拉长了传媒产业的价值链——让新闻实现了针对读者、广告主之外的第三次售卖。

张建说,中国出版集团、中华书局,作为中国最有实力、最有历史的出版单位,此次能在非常短的时间

内,以特事特办的方式,促成《1942 饥饿中国》这本书的迅速面世,是对《河南商报》这一组大型纪实报道的肯定,更是对这一段灾难历史的缅怀,是对历史的敬重、对生命的尊重。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,中华书局出这本书让他“很激动。”中华书局主要是做文献的,《1942 饥饿中国》就

是对1942河南大饥荒的翔实记录。他认为,实录比小说、电影更真实、更震撼。他说,这本书中的文字很打动人心,最重要的是“我们是中国人,不应该放弃这段历史”。

对于这本书,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,在“1942”70周年之际,河南商报以纪实报道的方式,对其进行回顾,并以《1942 饥饿中国》为名出版,不仅尊重历史,更尊重人性。作家阎连科也评价说,这是一部灾荒史,也是一部奋斗史,更是一部河南人的心灵史。

(河南)